

□ 姜豪

「九·一八」事变后



▲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

汪蒋妥协内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汪蒋妥协，最初是于1931年9月28日，宁方代表张继、蔡元培、陈铭枢，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分别抵达香港，进行秘密谈判。陈铭枢向汪精卫转交了蒋介石致汪的亲笔信，内容是表示应“牺牲一切，共赴国难”，过去一切“是非曲直”，他愿一人承担。谈判结果，达成初步协议，双方代表就于同月30日，共赴广州，继续同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谈判。粤方提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具体日期由蒋宣布，待释放胡汉民及十九路军调到南京后，南方代表始行北上，到上海商量出初步结果后，粤方代表才到南京。对此，蒋介石表示全部接受。

10月21日，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等到达上海，参加宁粤和平统一会议。这天汪精卫到达上海时，改组派人员及各方面代表数百人到码头去迎接，我和交大同学朱荫桐、周参等几个人也到场。当时万吨以上远洋轮船不能靠岸，只能停在江中，再用小轮船去接运乘客和迎送人员。我们搭乘的一艘接客

轮上，没有接到汪精卫，他另搭小艇先行秘密上单了。我们在接客轮上接到的，却是孙科等几个人。过了两天，我们交大的几个人再到汪的寓所去拜访，其时他住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香港何东爵士的公馆里。汪表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拉椅子，端茶杯，问我们学生运动的情况等，同我们交谈了约近半小时。

10月22日，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在上海会面，消除了芥蒂，商谈了今后的政局问题。特别是在汪蒋之间，由于宋子文的暗中拉拢，已经取得了某种默契，所以谈判的进展颇为顺利。在汪蒋会谈中，汪提出了粤方三项主张：（1）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即如西方国家的内阁负责制）；（2）废总司令；（3）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会后，汪代表粤方起草了会谈纪要，提出七项政治主张，以粤方代表名义，联名致函蒋介石。在会谈中，蒋提出个人进退的电文草稿，汪表示赞同。

蒋本来急求达成宁粤谅解，尽快召开国民党四全

大会,从而解决争端,所以要求粤方代表马上到南京去,不必经过会议决定。汪对此本无异议,但孙科坚持要求按照原来预定的程序进行,就是要在粤方各项要求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后,才能到南京去。汪精卫无奈,只好按孙科的意见行事。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汪蒋妥协后决定分别在南京和广州两地同时举行,因之一个大会变成了两个半会。南京的半会,于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举行,广州的半会,于同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举行。其中改组派代表又分裂出去,另于12月3日在上海开会。南京半会上有一项决议,就是恢复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关系而被开除的汪精卫、李济深、李宗仁等312人的国民党党籍。广州的半会由孙科主持,可是开会后几天的一个傍晚,改组派突然通知各代表,说是广东地方派要扣留改组派代表,叫大家马上离开广州。广九铁路也不能走,怕广东派在车站上抓人,所以只能乘轮船到香港。当时我们就匆忙地赶到了香港。可是究竟为了什么事情闹分裂了,改组派上层并没有宣布,大家也莫明其妙。

关于改组派和广东地方派闹翻的原因,以后才知道,是由于广东地方派反对汪精卫在和平统一会议上对蒋介石的过分让步。宁粤“和平会议”是同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由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过分让步,使粤方原来提出来的蒋介石必须先下野才能取消广州国民政府的条件,未能坚持,而在会上作出了“无须发表”蒋介石下野及粤府取消两个通电的决定,因之广州半会开幕后,粤方的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要在会上提出反对汪精卫的妥协,甚至传说陈济棠要扣留改组派代表,所以改组派临时作出了“溜之大吉”的潜逃决定。当时改组派的代表和孙科及其派系中人陈友仁、李文范等共有200多人,一夜之间潜离广州,到了香港后,改组派再组织其代表到上海集合。

12月1日和2日,改组派代表到达上海的有160多人,在上海有家的回家,无家的住旅馆。2日晚上,我在家里接到通知,说是3日上午9时,汪精卫约请至大世界共和厅谈话。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大世界是最肮脏的游乐场所,尤其共和厅是下等妓女“野鸡”集中活动的地方,以堂堂国民党领袖自居的汪精卫,怎么会借用这种地方见客呢?

12月3日上午8点半,我就到了大世界,一看气氛是和往常不同,大门口有十多个彪形大汉守卫着,还有几个改组派人员在招待来宾,进了大门,从门厅到共和厅,沿途还有不少彪形大汉在巡查。一进共和厅,已不少人先我而到,大厅内原有横排的戏场座位不见了,改排成两长桌,两长桌间加一横桌,成U字形,完

全是个会场的格式。我进了会场签过名,找了我们上海的几个人坐在一起。我问其他一些人,“今天干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将近9点,会场里的座位基本上都坐满了。9点正,汪精卫在曾仲鸣、王懋功、谷正纲等一大批人的簇拥下,走进了会场,在全体热烈掌声中,于横桌的正中坐下,马上有人宣布开会,并请汪精卫讲话。他讲话不多,只是些“共赴国难,全党团结”等等空话,并无具体内容。由于大世界下午要营业的,所以在汪精卫讲话后,有人简单地宣布,这个会议是广州四全大会的继续,由于时间关系,别的问题不讨论了,首先进行选举中央委员,并且当场就要开票。

选举票子分发好,叫大家坐下,马上填写,票子上分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两项,委员各有正式和候补若干名,依照得票多少而定。票子拿到手,谷正纲就来找我,他交给我一张名单,叫我通知我们上海的代表照选。接着江苏方面有姓金的代表来找我,说他们江苏有10多票,要和我们上海的10票交换,把他和我二人都选上去。我说我已答允照选谷正纲给我的名单了,不便再接受他的名单。开票结果,得票当选的,最少的只有20多票,假使我同意了金某的要求,我们上海和江苏合作,那末金某和我二人都可以当选了。事后体会到,他们布置这次会议的几个人,事前保密,临时突击选举,就是防止别人搞竞选,以便由他们来包办。

大世界是上海的“野鸡寮”,汪精卫的这批大世界中央委员,人们讽称为“野鸡中央委员”。国民党的四届中央委员,原定是由南京、广州、上海三地产生,再到南京一起开会,其中属于改组派的,计有执行委员汪兆铭(即汪精卫)、王法勤、陈公博、顾孟余、经亨颐、甘乃光,候补执行委员朱霁青、陈树人、王懋功、唐生智、陈采木、范予遂、谷正纲、唐有壬,监察委员陈璧君、褚民谊、张发奎,候补监察委员郭春涛、潘云超、邓飞黄、黄少谷、肖忠贞等。

12月4日,广东地方派继续在广州开会,也选举了中央委员。同月7日,广州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声明如蒋介石息兵下野,粤方自动撤消政府,随之蒋介石提出辞职。同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照准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任命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12月22日,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宁、粤、沪三地产生的委员都参加了,宣告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会上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会上又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

蒋介石表面上辞职下野,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同年

12月22日,蒋在南京陵园约请改组派要人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晤谈,表示在此国家危亡之际,要请汪精卫为国民党的领袖,出面主持一切。他说在上海时曾向汪面述此意,但汪太客气而表示不就,所以要他们再行向汪转达此意。他表现得非常恳切地说:“中兴本党,非汪莫属。”

蒋介石要弄以退为进的手法,汪精卫却也故作退而让贤的姿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他称病住院没有出席,表示与蒋同进退。当时他不急求上台,等待更有利的时机。1932年1月16日,蒋介石为了重新出山,邀请了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四人至杭州,于18日在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议,达成了汪蒋合作、共同主持南京军政事宜的协议。同月21日,汪蒋二人先后到南京,蒋发表谈话时说,他对国事别无主张,“汪先生的主张,即为余之主张”,回南京是“赞助政府,共纾国难”。汪也发表谈话,说是他对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决心,至为敬佩”。两人各施计谋,互相吹捧,实际上是在进行政治分赃的买卖。

1932年1月22日,汪蒋联合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交换对外交、军事、财政等各项问题的意见。同月24日,孙科在内外交困形势下,请辞行政院长。同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批准孙科辞职,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接着,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至此,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汪蒋共管党和平分权力的格局,并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妥协、对内反共的政策。

汪精卫主掌行政院长,改组派主要人物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长。铁道有收入,这是行政院内最有钱的单位之一。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又兼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部内有商标局和商品检验局,也是财力比较好的单位。此外改组派的上层人物,很多也担任了中央党政机关要职,如褚民谊当行政院秘书长,郭春清当实业部次长,谷正纲当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改组派人员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汪精卫一上台,大家弹冠相庆,忙着做官去了,至于什么群众组织工作,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做官要靠拉私人关系,改组派的组织从此无形解体。我因为在改组派内负责主持过上海工人运动,总算安排我到中央民运会工人科工作,先当干事在南京工作了几个月,由于上海时常发生工潮,就派我常驻上海做工会工作。那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工会工作有点脱节,就是黄色工会,CC系也不能控制,改组派对工会也已放弃活动了,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矛盾依然存在。如在汪蒋合作的过程中,陈铭枢是在汪蒋之间奔走拉拢的,因之除他的部队十九路军驻守宁沪线外,他本人又充当了交通部长。铁道部是从原来的交通部分裂(下转第50页)

□ 樊崧甫(遗作)

抗战时期 蒋管区

兵役奇闻

兵役制度有征兵、佣兵、民兵三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始终采用佣兵制,是一支无根的私人所有的部队,整编师、暂编师,编制复杂;中央军、杂牌军、地方军,待遇歧异,装备训练,今古奇观。八·一三抗战开始时全国陆军师番号有二百多个,蒋介石自己也不晓得他部下有多少兵,多少枪。统而言之,约二百多万,的确是一个叫化子土匪集团。

一、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我向蒋建议建立征兵制度

八·一三上海发动对日抗战后,蒋介石利用抗日机会把各地方不受征调的部队,都调到南北战场来硬拼,牺牲最多的是在上海。他对这些部队的看法,是割据的工具,打光了无所谓。海军兵舰炸沉了封锁江阴长江航道,他说这些兵舰是福建人向中央敲诈的工具,搞完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立。抗战能在上海多支持几个月,给英美列强看看颜色,出来一调解,中日达成和议,他自己就可雄视一世、独霸中国无敌了,至于对于部队的补充,绝不过问。1937年10月中旬,上海已拼了两个月,是时我率领四十六军驻西安潼关线警备整训,我以反对法西斯见忤于蒋,另一方面蒋留浙籍部队在蒋鼎文指挥下控制西北,未调前线,我是只顾军事、反对内部政争的一员,看到全国部队行将调空,毫无预备,万一第一线崩溃,日寇长驱直入,不能再事抵抗,觉得非常危险,即给蒋去了一个亲笔密电,原稿丢了,大概忆述是“钧座专心指挥上海作战,迭挫敌锋,职钦佩无似,惟全国现役兵役有限,恐剧战三月,二百万军可消耗殆尽,恳请钧座考虑;后方可调部队尚

德。此御匾一直珍藏在东华医院,直到1983年,特聘专家精工重修,箔镀真金,并悬于文武庙,“以祈神威降祥,普佑众生”。^[1]

每当故乡发生天灾天祸,香港华人同乡宗亲会或各邑团组织,立即发起赈灾运动,提供援助。如1915年珠江三角洲各县发生空前严重的大水灾,东华医院通过沿门劝捐行动,仅3个月内即筹得近57万元。其他如九江商会、旅港顺德商务局、旅港番禺公所、各行业商会等,亦争相响应。^[2]1922年潮汕飓风,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一面派代表驻汕施赈,一面分函海内外吁请募捐,竟达60万元之巨,解决了大问题。^[3]1931年夏秋,全国洪潦泛滥,灾遍7省,为祸惨烈。普益商会乃组征求队,吁请各界及行友捐助,奔走兼旬,集赈款2万余元,汇交华洋义赈会分赈;^[4]香港电器商会主席陈颂薇暨司理陈磐石发起募集款项,汇赈灾黎;^[5]香港集木行商会亦“尤为悉力捐输慨助”。^[6]1949年夏,广东三江洪患,20余县受灾,崩堤150多处,淹地470万亩,212万人受灾。7月16日,东华三院在广州成立赈灾办事处,着手调查灾情和赈济工作。^[7]

此外,香港华商社团对于内地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尤多提倡协助,可谓“凡属有益社会事业……无不襄助”。^[8]此类例子很多,实在不胜枚举!

可以说,香港华商社团的兴起和发展,加强了本埠华人社会的自助作用及其与乡梓的联系。它继承了中国人传统注重联络感情(包括亲缘、地缘及业缘)的因素,又采纳了近代商会的组织形式,因而成为联系、团结全体华商的牢固纽带,实际表现亦证明其是凝聚而有效率的。

[1] 霍达:《烟雨文武庙》,1995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2] 《香港与近代中国》,第110-111页

[3] 赖连三著,李龙潜点校《香港纪略》,第73页。

[4] 《侨团史略·普益商会》,载《百年商业》。

[5] 《侨团史略·香港电器商会》,载同上书。

[6] 《侨团史略·香港集木行商会》,载同上书。

[7] 《广州市志·大事记·第二部分(1912-1949)》,未刊稿。

[8] 《侨团史略·华商俱乐部》,载《百年商业》。

(上接第53页)出去的,除铁路外,其他的国有交通事业仍归交通部管辖。陈铭枢当了交通部长后,CC方面对他不乐意,因之由CC系搞工会工作的陆京士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到全国邮务工人罢工,意图搞垮陈铭枢。

陆京士原来是上海邮政局的邮务生,从邮务工会起家,成为CC系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1932年陈铭枢当了交通部长后,为了打击陈铭枢,以要求增加工资为名,陆京士等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除进一步策动全国邮工支援外,并策划上海各业工会支持,意图发动上海各业的同情罢工。陈铭枢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就找了陈公博一起到上海来设法平息邮工罢工和防止其他各业工人的同情罢工。因为陈公博负责的中央民运会和实业部是主管工潮的机关。陈公博一到上海就找我商量办法,他要我联络上海各业工会反对邮工罢工,经我集合了以前在改组派搞工人运动的几个人,商决发动一个呼吁邮务工人复工运动。我们起草好了一份呼吁邮工复工的信,各人分头找各业工会负责人联络,并请他们在呼吁邮工复工信上签名。通过几天活动,上海各业工会中绝大多数工会负责人签了名,随后把这些工会联名呼吁邮工复工的信,一方面送给邮务工会,一方面在报纸上发表。这样一来,邮务工会的声势大受打击,上海各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意图流产了。邮务工会同交通部谈判要求增加工资问题,不久就得到了解决。通过这一次事情,CC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汪蒋合作,改组派的人员首先安排到南京中央的党政机关,然后有些人也插足到省市机关去。1933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换届改选,改组派提出来要插足进去,CC表示接受了,却把我安排为监察委员。在国民党机构中,安排为监察委员的都是年龄大一点的人,有名无实,类同虚设。而我那时还不到30岁,正当年富力强、应当实干的时期,安排我这种有名无实的职务,这是CC系在汪蒋合作中一种“巧妙的应付手法”。

至于陈铭枢,并非蒋介石嫡系,他是广东人,生于1889年,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同盟会会员。他从营长逐级升到军长,又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主席等职,资历很深。1931年6月,他的部队改编为19路军调驻宁沪一线,作为汪精卫到南京的安全保障。但19路军是支爱国的部队,在上海奋起抗敌,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但蒋介石痛恨他们打乱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所以迫使他们停止抗日,汪精卫又是患了恐日病的,终于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